

吳懷中 研究員/吴怀中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所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所长

日 時 : 2022 年 3 月 23 日

时 间 : 2022 年 3 月 23 日

場 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地 点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使用言語 : 中国語及び日本語

使用语言 : 中文、日文

聞き手 : 野口裕子

采访者 : 野口裕子

(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目次】

1. 日本との出会い
2.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の思い出
(1)初の訪日 (訪日研究)
(2)日本側の教授陣
3.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時代と現在の研究のつながり
4. 日本研究者の役割と国民感情について
5. 中堅研究者として

【目录】

- 1.与日本结缘
- 2.回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1)初次访日 (访日研究)
(2)日方教授阵容
- 3.日研中心与我的“另类”研究
- 4.日本研究者的作用与国民感情
- 5.作为中坚研究者

【本文】

※インタビュー対象者の使用した言語に基づいて整理しています。(下線部は日本語でのご発言部分) / 根据采访对象所使用的语言来整理。(下划线部分为受访者用日语发言的部分。)

1. 日本との出会い/与日本结缘

我出生在江苏，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过去这个地方跟日本关系就比较密切，从唐宋开始，因为遣唐使、遣隋使，一直到遣宋使，很多都是从南方登陆，从浙江宁波经过江南，经过扬州到长安。所以我的家乡，不管是第一故乡第二故乡，不管是扬州还是南京，应该说都留存了大量的跟日本方面自古以来千年以上交往的历史，这种故事流传了非常多。我成长的故乡，我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的学生的生涯，初中到高中。非常有名的鉴真大和尚、大明寺，这个在日本可能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唐招提寺跟我们扬州的大明寺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跟日本方面很多的这些友好交流和佳话，所以说对日本很早就有兴趣。

80年代，我刚明白事理的时候，就知道日本的文化，流行文化，日本的电器，日本所有的技术产品等等这些，还有日本的整个形象品牌力，在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应该说80年代也是中日交流与合作非常盛行的年代，当时日本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举国上下甚至比中美交流还要频繁，还要热络。中美那时候，因为我们刚打开国门，美国的产品、技术、人文这些交流都没有进来，但是中日之间已经开展起来了。所以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那个时候日本很可能就是对中国来说影响最大的外国之一，而且中日之间有很多文化、艺术等等各方面相通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还不觉是外国，非常有亲切感。在这种氛围之下成长的自己，自然而然地耳濡目染，我考上了国际关系学院，选择国际关系专业，开始学习日本语言与文化文学。

当然，像现在这样从事日本现当代研究我倒没有想到，因为过去一直是文化与文学。后来我考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研中心的主要学科是文学、文化、社会，那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学问，跟现实不是太挂钩不是太紧密。当时在那个阶段，我觉得跟日本，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贵基金也产生了联系，受到基金的资助，我们打下了做学问的初步基础，尤其是基础方面的一些知识等，那么后来受基金的资助，更进一步对日本研究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兴趣。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从基础到现实，从古代到现代，我就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兴趣，想把日本这个国家，日本的思想文化，日本的现当代中日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当中的中日关系、区域关系，我想研究得更明白一点，所以就选择了这条道路，一直走到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历程。

2. 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の思い出/回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1)初の訪日（訪日研究）/初次访日（访日研究）

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93年3月到9月。就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访日研修半年。

その時は東京大学の社会科学研究所に在籍しまして平石直昭（ひらいしなおあき）先生に師事しました。平石先生は丸山真男先生の門下ですよ。そこからですね、非常に厳しい学問的なトレーニング、薫陶を受けまして、その後の勉強にとって非常に役立ったんです。

首先是对于历史事实的调查，要忠实于资料和史料。研究不是说靠你的主观去想象一个什么东西，尤其搞思想史、历史学，搞人文科学，你需要带着你的问题意识去找一些资料，那么根据资料来补充修正，或者是去找到一些新的观点。所以我从的我老师，平石老师那儿，也包括后来所跟随的渡边浩老师，还有松泽弘阳老师，他们都是“丸山先生の門下で”，他们做学问这方面非常的严谨。那么你带着问题意识，你想对前人的研究做出一个什么补充或者是修正，或者是你发明了自己的一个新的见解，一个创建，带着这些问题意识，还有一些比较严谨的方法论，像历史学的很多的方法论去做研究。我觉得从一个语言学习，一个大生本科阶段上来的这么一个 new player，一个新手，“卵”，应该说我的学问的第一课最扎实的是在东京大学的社会研究科接受的。当然它对我的知识冲击是非常大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冲击，因为确实两国在很多方面比如治学方面，对待资料方面，是先有问题还是先有结论等，这些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2)日本側の教授陣/日方教授阵容

修士課程の終了後、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に残り、助手として勤め、3年たって講師に昇進しました。合わせて、足掛け5年かな。そのあとは国際交流基金のスカラシップを受けて博士コースに進学しました。言ってみれば私は「直系」ですよ（笑）。いい言葉はいきなり思い出せませんが。その間の思い出は本当に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对我印象很深的，我很感谢的，当然很多，他们都非常优秀，勤勉。当然治学各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大家。尤其是我觉得在90年代，毫不夸张地说，国际交流基金派过来的都是一流的学者，都是大家。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仅仅是刚踏上学问之路的年轻人，那么日方应该说不惜这种成本，派国内那么多的一流的大家过来，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不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因为很可能是“对牛弹琴”，我们仅仅是刚开始接触学问之道，很多东西那么深刻，我们当时还理解不了。说老实话，以他们的这种水平，应该是去教博士或博士后都绰绰有余，但是他把很多时间花在了我们这些完全的初学者、初心者身上，当时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当时的大家是非常多的，源了圆、中根千枝、竹内实，这种思想史、社会学的，还有

搞中国研究的像野村浩一。当然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几位老师，木山英雄、渡边浩、平石直昭、松泽弘阳，非常多的一些优秀的老师，这是一种资源的宝库，所以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也正因为如此，我想至少我所知道的我们那几代的学生，感激于这种资源和支持，我们学习是非常认真刻苦的，基本上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泡在图书馆，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可能有了这种网络，有了各种 SNS，是不是不用一天到晚在那看原著原典了。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真是那样的，我不敢说 100%，但是我们当时 20 个学生一个班，起码有十六七个、十七八个，真是基本上是“宿舍、食堂、图书馆”，我们叫“三点一线”，每天勤奋学习过来的。

所以我的进步我觉得在那时候是非常大的，因为确实是读原典原著，然后跟日本大师、大家交流，因为他们就住在友谊宾馆，联系非常方便，有时候还会请我们去做客，我们可以直接交流。

像竹内实老师，当时我在的时候，他是主任教授，我们经常交流很多事情，直接就在友谊宾馆，一边吃，一边交流。我们有时候还不单是一种学问的关系，它对于我整个治学态度的培养，真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中印象比较深的，像竹内实老师、野村浩一老师，木山英雄、并木赖寿等老师，还有我去日本读博士的时候，名古屋大学的川田稔老师，可能当中有好几位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不知道野村老师现在还健在不，如果健在，应该 90 多岁了，我十分牵挂他。另外对我有帮助的，像大东文化大学的校长和田守老师，去年已经去世了，太遗憾了。还有像佐藤保老师他们，主任教授他们很可能都 80 多、90 多了。我在中心读书的时候是 21 岁到 24 岁，可是我现在已经超过 50 岁了。

这些教过我们的老师很多都已经很年迈了。有机会办一次和他们这样的聚会。当时八九十年代来过中心，执教过我们的老师，由国际交流基金邀请，来一次聚会，因为很多人慢慢地就不在世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这种互联网时代，很多联系就中断了，联系不上了，像野村老师，我特别想跟他联系，但是后来就是联系不上，我只知道他在东京，但是可能已经 90 多岁了，非常担心。疫情现在三年多，我已经三年多没去日本了，我就是想去日本想拜访他们，现在都做不到了，所以非常遗憾。我非常想念他们。

3.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センター時代と現在の研究のつながり/日研中心与我的“另类”研究

要说是中心培养的，国际交流基金培养的我们这些人当中，我可能算是比较“異色”，“異色な学者”，因为我们中心培养的很多都是在大学里面，研究文学、文化，还有一部分日语老师，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各个地方机关的一些外事干部。像我这样研究当代日本问题，还是比较热点的一些问题，焦点的一些问题，还走到了这一步。可能是一个稀有存在。因为我觉得基金帮助培养了那么多的人和人才，如果大家去做同样的文雅的研究，当然我们非常需要文学、文化、思想、艺术、宗教、哲学的研究，但是我们培养了那么多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面对世界形势变化这么快，面对中日关系这么敏感复杂，这些人才当中出这么几个人去研究现当代中日关系，对改善两国关系如果有所帮助有所裨益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不可以。

我可能走的路有一点不是非常经典的传统的这种，中心培养的，基金培养的道路，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我前期在中心在日本学习了很多基础知识，实际上中心的课程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古代一直学到近代。应该说对整个中日关系史，对日本的历史，我们都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基础。我们也知道不管研究国际关系，还是当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不了解深厚的历史背景，没有历史的知识素养来做底色的话，现当代研究可能也走不远。也不能够看出在历史长河当中，这种现当代关系的特点，特色，规律。我在博士阶段后期的几年时间都是在做历史研究。有了基础之后，我再放眼去看现当代，把现当代和历史结合起来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视野当中，来研究两国之间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的特长，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事实证明这条路径还是可以的，因为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现当代中日关系的，他是学习国际政治出身的。但是中日关系跟任何一个中外关系不一样，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历史就是 200 年，美国的国家历史就是

200年。然后我们跟欧洲有关系大概是在中世纪以后，到目前为止最多是五六百年、六七百年历史。但是中日之间有2000年的交往历史，我们不是现在才开始交流的，我们也不是近代才开始，我们很早很早就开始交流，而且在这种交流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认知，很多是已经形成了，宗教、哲学思想，对方的民族是怎么样一个特性、对方创造了什么文化，我们相互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促进、文明互鉴，其实一直影响到现在。我觉得研究中日或者是研究日本，跟研究其他的是不一样的，与中美、中俄、中欧这些都不一样，不知道历史恐怕就不足以知道今天的日本和中日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不妨做一下这种尝试，就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4. 日本研究者の役割について/日本研究者的作用与国民感情

过去我们研究日本，作为学者，我们知道，日本在现代化的很多方面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不管是工业化、环境保护，还有一些社会治理等等，应对这种近代世界的冲击，怎么样去适应世界、接轨世界。所以作为学者，我们在沟通中日关系方面，那时候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日本好的方面，做得好的方面、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到中国来，在中间起到一种知识桥梁的作用。知识分子、学者就是“知的橋渡し”这种作用，我觉得应该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打开国门的时候，学者相对比较能够客观全面地看问题，知道外面的世界，我想这也是学者的一个责任。

到最近几年，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发展起来后，也就是外面世界所说的“Chinese rise”，“中国の台頭”，这种发展崛起对外部世界客观上是有外溢影响或造成一定冲击的，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你的体量变得这么大之后，周边世界国家一点感觉不到，这不符合唯物主义科学。从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来看，这一点都不奇怪，不是中国一国崛起的一个特有现象，这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正常的或经典的现象。从斯巴达克斯到雅典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学者就不单是在中日之间交流，起到一个介绍外国经验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向周边国家，包括像日本、向整个世界去更好地、全面地解释中国现在的发展。比如，中国可能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或者说比你们想象的要好，或者还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有些外国人光看到了北上广深，光看到了北京、上海，所以说觉得中国如此发达，但实际上我们中西部地区或一些内陆地区，不那么发达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的环境治理、社保医保政策还有需要发展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双向的交流，不但要把包括日本在内的好的文化、经验，吸收或者是介绍过来，我们同时还要向世界更好地去说明一个全面客观的“中国像”，我们要起到这个作用，这是一种双方向交流。这个当中，我想我们学者应该很理智客观理性地去发挥作用，应该起到其他的群体，像记者、官僚、财界的这些人士所起不到的作用。

两国的国民感情目前来看民调数据不太理想。国民感情，数据居低不高。受这种结果的影响，它形成了一个反冲击，中国方面可能我们的民调现在数据也是有高有低，总体来说也不是太理想的。刚才我也说到了，这里面原因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客观方面刚才已经说了。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之外，主观上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主观上就是说现在交流少了，想想疫情期间人员交流几乎“途絶えた”，很多是凭自己的想象去报道、去采访，按照自己的偏好去塑造报道，其他的我不敢说，我所见到的一些就是这样的，它是先有结论再去找材料，然后去报道这个国家，而没有实地地去采访调研，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或者说在这种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合理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不合理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没有去好好地调查。再加上现在雪上加霜，整个世界的交流都停顿下来了。不但是中日之间、中美之间都是这样，中欧，欧洲也是这样，欧洲疫情那么严重。

我想这些主客观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调数据，对对方的感情都不太理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民意是基础，基础不牢，对两国长远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而严重的。我想基金会也好，我们日本研究所也好，我觉得在疫情缓解之后，总要采取一些办法增加交流，来消除这种双方的误解，增加信任，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历史上的教训有很多，很多是由误解引起的，误解越结越深，最后导致了我们大家都不想要的结果，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个是我们需要下大力气、下决心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5. 中堅研究者として/作为中堅研究者

我这个问题倒没有系统地思考过，但是我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色，你比如说比起（编者注：同天上午采访的）汤重南老师和蒋立峰老师，首先我们觉得我的基础的一些学问可能没有他们坚实，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格，他们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上信息，全在大量地看一手资料、看原典、有时间去咀嚼细思，我觉得他们基础可能比我们打得要牢，要坚实，我们中国人叫基本功非常扎实。但是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到了我40多岁、30多岁的时候，我们的物质条件，国家整个的财政的投入，跟他们那个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才有机会，比如说我可以去美国，我可以学学英语，我可以利用很多英语资料，因为我在哈佛大学待过一年，在傅高义老师那儿，我想可能年轻一代学者的视野会比老的一代宽阔一点或思维活泛一点。这其实不是人的问题，更是条件的问题，过去没有条件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除了日本之外，再去世界其他国家，从那个角度吸收很多资料 and 营养，再回过头来看中日关系，看日本，过去老的一代老师很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可能我之后的年轻一代，很可能就比我条件更好了，能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我也是到了40多岁才第一次去美国学习，才好好地去非常系统地学一些美国的日本研究或者是英语等文献。现在“次の世代”，像我们所里面有年轻的一代，一出来就是双语、三语，一开始就会熟练地运用网上检索，到Google scholar系统，去检索很多资料，可能比我们这代人发展条件要更好。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格，是不是说哪一代就是完美无缺的？就是最好的？我觉得不一定，各有特色。我本人比起“古い世代”，我觉得在很多基本功方面不如他们。我们中国非常讲究这个，我们中国武术也是这样的，武术如果不练内功，内练一口气，基本功不好的话，它会影响很多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网上的很多东西，看大部头的原典原著的时间越来越少，我注意到这个现象，这个其实是有影响的，所以要做一个好的学者，可能就是要把这些方方面面结合起来，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能有一个成为大家的潜质。

我想现在条件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刚开始做学问的时候，我跟我的日本老师的联系都是通过信函，年年发送贺年卡。后来有那个电子邮件，那么再后来可能就是更方便的，现在有LINE，然后这边有微信WeChat，直接就可以联系了。现在跟日方的，不少学者就开始用手机，用微信和我们的和日方的LINE直接联系了，这个是实时瞬间就可以联系了，而不像过去。过去，需要发个电子邮件去商量一个事情，来回有时候要好几天。在这种便利的条件之下，我想中国的学者对于两国形势的把握，互相交流，对两国一些关系的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好、更及时、更充分、更全面。条件现在已经摆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现在还跟不上这种形势，还不能很好地利用现在的条件，我觉得真是一种遗憾。

另外我也希望国际交流基金，还是要更加关注和支持年轻一代尤其青年学者的交流。我自己就感觉到学界及周围的学者可能已经好几年没有长期访问学者了，可能都没有一位学者，包括利用国际交流基金的“助成”这种奖学金，去日本待半年以上的可能都没有了。由于各种原因，日本学者对来中国交流可能也有，尤其包括疫情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应该持续下去。

其实很多东西归根结底说到最后，是人和人的关系，没有人和人的关系，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很多这种知识的传播交流都没有办法做到，我觉得这方面国际交流基金可以继续地给予支持。われわれのほうも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希望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目标就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和平友好，互相促进，互相去交流，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

时代往前走，我们应该更开放，我们应该更坦诚地、更友好地交流才对，双方之间的互动，应该更频繁地开展起来，我有这个衷心希望。

公開：2023年6月15日

複製・編集を禁じます
禁止复制编辑文稿内容